

欧?修?学思想在日本的受容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Acceptance of Ouyang Xiu's Calligraphy Thought in Japan
著者	? 米?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文化交渉 :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 :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Cultures
volume	10
page range	151-169
year	2020-11-30
URL	http://doi.org/10.32286/00023401

欧阳修书学思想在日本的受容

张 米 琪

The Acceptance of Ouyang Xiu's Calligraphy Thought in Japan

ZHANG Miqi

Abstract

Ouyang Xiu was a literary lead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 not only mad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but also achieved considerable accomplishments in calligraphy. Ouyang Xiu's contribution to calligraph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his new calligraphy theories, which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hangyi" writing style in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 Ouyang Xiu's calligraphy theory and calligraphy works, one can summarize his calligraphic thoughts, which are "Yide Weixian" (prioritizing morality), "Xueshu Weile" (studying calligraphy gives joy), "Zicheng Yijia" (have your own innovative style), and "Xueshu Youfa" (learning calligraphy can't be without rul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pread of Ouyang Xiu's calligraphy theory-inspired works in Japan, the Ouyang Xiu's calligraphy theories was quoted in Japanese calligraphy theories, and Ouyang Xiu's calligraphy thought was embodied in "Wuzhutang Shuhua", exploring the acceptance of Ouyang Xiu's calligraphic thinking and approach in Japan.

Keywords: 欧阳修, 书法, 思想, 受容, 日本

前言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史学类著作,于经学、易学也有涉及。欧阳修作为北宋的文坛领袖,不仅在文学领域上有所成就,于书法艺术上也颇有造诣。欧阳修在宋代虽然不像“宋四家”以书名为盛,但他却提出了崭新的书法理论,其书论奠定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创立,宋初书坛推崇颜真卿的风气也与欧阳修的倡导有莫大关系。其书学思想还影响着中国的后世书家。欧阳修在书法实践方面虽然并不突出,但他在书法史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人。

书学思想往往体现在书论或书法作品中,欧阳修的书学思想主要可归纳为四点,分别是“以德为先”、“学书为乐”、“自成一家”、“学书有法”。本文通过考察含有欧阳修书论的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及日本书论中所体现的其书学思想,探究欧阳修书学思想在日本的受容。

一 有关欧阳修书论的著作在日本的传播

如今,研究欧阳修的书论主要以《笔说》、《试笔》、《集古录跋尾》为参考,但其实欧阳修并没有专门讨论书法理论的著作,其书论内容大多散见于其书信、随笔中。正如《笔说》、《试笔》的内容原是欧阳修平日所写的随笔、日记,后人将其汇总并单独成书。《笔说》的编订人应为欧阳家后辈(欧阳发、欧阳棐),由于其编排杂乱无序,故其来源可能出自多个收藏家之手。《试笔》的编订人或为北宋收藏家刘季孙,或为欧阳家后辈。与《笔说》不同的是,其条目编排清晰有序。《集古录跋尾》原是《集古录》中欧阳修对所收集碑刻的题跋,欧阳家后辈在欧阳修去世之后将题跋部分单独刊行成《集古录跋尾》。

此外,还有后人编纂的欧阳修文集和收录欧阳修书论内容的历代丛书。文集主要以南宋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为经典,由于成书时代早且内容全面,后世的欧集基本以此作为底本。南宋吕祖谦《欧公本末》较之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成书时间更早,但因为收录内容没有周本欧集全面所以流传不广。

关于丛书,根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总目》中的记载,共发现含有欧阳修书论的历代丛书19部。分别是(宋)左圭《百川学海》、(元)陶宗仪《说郛》、(明)熊佑《重編集类说郛》、(明)陈继儒等《陈太史重订百川学海》、(明)程胤兆《天都阁藏书》、(明)王世贞《王氏书画苑》、(明)毛晋《津逮秘书》、(清)黄本骥《三长物斋丛书》、(清)朱记荣《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清)于敏中等《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清)牛运震《空山堂全集》、(清)李元春《青照堂丛书摘》、(清)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民国)刘峙《宋庐陵四忠集》、(民国)上海文明书局编《唐宋十大家尺牍》。张元济等《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编《丛书集成初编》。

以下，通过查阅、总结日本各时代目录性质的书籍，探究含有欧阳修书论的著作在日本的传播情况。既包括欧阳修的著作，又包括后人编纂的欧集和含有欧阳修书论的历代丛书。

1 平安时代末期贵族日记中的记录

在平安时代中后期，贵族有书写日记的风潮，这些日记反映出当时贵族们的日常生活，内容里时有出现当时贵族们所阅读的书籍名称。通过查阅日记中的汉籍书目，可以看出平安时代中后期汉籍在日本的传播情况。

沈少康《日本平安时代东传汉籍之研究—以公私文献为史料》¹⁾一文，通过查阅官方文献和私人文献，详细考察了平安时代可见的汉籍书目。其中官方文献指日本史书“六国史”中的后四部：《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由于“六国史”前两部的时代早于平安时代，故未有查阅。私人文献则是指平安中后期的贵族日记。官方文献记录了平安时代前期792年到887年的历史，私人文献记录的时间可从888年延续至1127年，时间上覆盖了整个平安时代。由于欧阳修的生卒年月是1007年—1072年，所以有关其著作的记录应该在平安时代贵族的日记中，也就是私人文献。

以下，是沈少康“私人文献汉籍目录”中，有关欧阳修著作的总结。

《新唐书帝纪》（《台记》“九月三十日”条 康治二年 1143年）

《五代史记》（《宇槐记抄》“九月二十四日”条 仁平元年 1151年）

《新唐书》（《明月记》“四月二十一日”条 嘉禄元年 1225年）

其中三处私人文献中出现了欧阳修的著作，《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五代史记》成书于1053年，距离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分别经历了83年和98年。然而上述记录中没有与书论相关的著作。可推论欧阳修作为《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编纂者之一，在平安时代末期已经被当时的日本贵族熟知，但其传入日本的著作为史学类著作。

2 《金泽文库古书目录》²⁾ 中的记录

近代两宋刻本传入日本多是20世纪初日本新兴权贵从中国购入，其中以静嘉堂文库购入陆氏韶宋楼藏书最为著名。³⁾而在古代，关于两宋刻本的大量传入，并不是和中国宋代处于同时期的日本平安时代末期与镰仓时代初期。陈翀通过北宋时代传入日本的大藏经均为宋代皇帝所赠，及平安时代日本权贵阶层藤原道长尚不能随意得到北宋刻本两点，得出两宋时期，特别是北宋时期宋

1) 沈少康《日本平安时代东传汉籍之研究—以公私文献为史料》，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12月。

2) 金泽文库编《金泽文库古书目录》（东京 岩松堂书店，1939年5月）。

3) 陈翀《两宋时期刻本东传日本考—兼论金泽文库之创建经纬》（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

刻本很少传入日本的结论。

宋集有机会大规模传入日本的时间，根据文献《贺长尾平五公捡金泽文库禅诗轴并序》：“昔金泽大夫君，遣使于支那国，航万里鲸波，运载群书，以为我本朝之宝。大夫君乃称名寺大旦那也，故寺旁建文库藏之，天下图书之府也。……延德三年岁次辛亥秋之中。”⁴⁾可知“金泽大夫君”曾从中国向日本运载了大量书籍，并建立文库用以收藏这些书籍，也就是著名的金泽文库。据陈翀考证，建立金泽文库的“金泽大夫君”应是执掌镰仓幕府的北条实时，因为只有北条实时执掌镰仓幕府时东亚海域存在大规模运载书籍的条件。此时正值南宋末期，所以此次从中国运载群书，便应有大量宋集随之传入日本。

通过查阅《金泽文库古书目录》中的“汉籍”类，可探究欧阳修的书籍是否也在此次传播到日本。其中两条书目与欧阳修有关：一是“史”类中，欧阳修等人奉敕编纂的《新唐书》一册，《金泽文库古书目录》中记为《唐书》一册，宋刊本，尾州家书籍目录所载。二是“集”类中，《欧阳文忠公集》百五十八卷，卅九册，宋刊本，有金泽文库墨印第六号印，现为京都伊藤孝彦氏藏。此《欧阳文忠公集》卷数为158卷，符合南宋周必大编纂的欧集153卷外加附录5卷的记录。故金泽文库所收《欧阳文忠公集》应是周必大编辑，此本欧集收录最为全面，含有与书论有关的内容。《金泽文库古书目录》中关于《欧阳文忠公集》还有如下记载：“(第八册) / 享保甲寅復月伊藤长坚补写 / (第十七册) / 乙卯八月长坚补写 / (第卅九册) / 明和八年辛卯三月十七日读了 东所”⁵⁾伊藤兰岬字长坚，是日本儒学家伊藤仁斋的第五子，伊藤东所则是伊藤仁斋长子伊藤东涯之子，伊藤兰岬和伊藤东所为叔侄，二者均是江户时期的儒学家。

可知，此时除史学类著作外，欧集也已传入日本，并且由于有伊藤兰岬的补写和伊藤东所的注释，可证《欧阳文忠公集》在日本有受众。

3 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中的记录

在江户时代，长崎是日本唯一开放的对外口岸，是当时日本与外界文化交流、物品交易的中心。虽然当时的舶来品数量可观，但是其中书籍的所占比例却很少。又由于限制唐船入港数量的“正德新令”的颁布，使得从中国向日本输入书籍更加艰难。为便于管理，长崎对舶来物有专门的记录。根据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⁶⁾，可将这些记录分为第一次资料、第二次资料两类。

第一次资料是指对有关于贸易业务的直接记载，未有后续编辑。比如记载何年月何船载来何书籍的《賚来书目》，记载舶来书籍的大致内容的《大意书》，以及记载相关账目的各类诸账《书籍元帐》、《直组帐》、《见帐》、《落札帐》等都属于第一次资料类。以下表格1，总结第一次资料

4) 《贺长尾平五公捡金泽文库禅诗轴并序》，见陈翀《两宋时期刻本东传日本考—兼论金泽文库之创建经纬》（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

5) 《金泽文库古书目录》汉籍“集”类（东京 岩松堂书店，1939年5月），第81页。

6) 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81年）。

《赈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帐》、《见帐》、《落札帐》中有关欧阳修著作的记录。

表格 1

第一次资料	与欧阳修有关的著作
《赈来书目》	《欧阳修集》二部二十套，己卯七番船
	《欧阳文萃》一部计一套，享保二十年（1735）第二十番船宁波船
	《欧阳文萃》一部一套，文化二年（1805）丑八番船
	《说郭》一部，享保四年（1719）六月第十二番南京船
	《说郭全书》一部，享保四年（1719）九月第二十二番南京船
	《说郭》十部二百套，宝历己卯（1759）一番船
《大意书》	《说郭》六部各二十套二百本，宽延三年（1750）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十番船
	《津逮秘书》一部二十套二百本，宽延三年（1750）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十番船
	《百川学海》一部二十套十六本，宽延三年（1750）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十番船
《书籍元帐》	《欧文忠公集》疵本一部四套，天保十一年（1840）子二番船，四十目
	《欧文忠公全集》一部四套，天保十一年（1840）子一番船，五十目
	《欧阳文集》一部一套，弘化二年（1845）巳三番四番五番船，十二两
	《百川学海》一部四套，嘉永五年（1852）子二、三、四、五番船，三十八两
《见帐》	《津逮秘书》，天保十四年（1843）
《落札帐》	《津逮秘书》，天保十四年（1843）

第二次资料指将第一次资料进行整理后又再次编纂的资料。如《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分类舶载书目通览》、《购来书籍目录》等目录书籍。

《舶载书目》⁷⁾共40册，由于没有序跋所以作者不明，现藏宫内厅书陵部。《舶载书目》为写本，由于书中记录的笔记、格式等均不统一且差距较大，所以可能由多人合编完成。其编纂所依据的资料，根据“長崎の向井家の舊記を書寫して作成したと考えざるを得ず……”⁸⁾可知，可能是利用向井家所藏的旧记完成的。向井家在长崎一直世袭“书物改”这一职位，书物改主要负责调查当时的舶来书籍中是否存在与基督教、西洋文化等有关的禁书，因此需要对每本舶来书籍的内容进行了解，所以向井家所藏的旧记内容应十分全面。据大庭修考证，《舶载书目》虽然并没有将向井家的旧记全部收录，但也是非常珍贵的书目记录，内容详实。

《商舶载来书目》原为10册，后将每两册合为一册成如今的5册。作者为长崎书物改役五代目的向井富。据书中凡例：“此编据家藏旧记而辑录……”⁹⁾可知，《商舶载来书目》同《舶载书目》一致，也是根据向井家的旧记编纂而成。

以下表格 2，是第二次资料《舶载书目》、《商舶载来书目》中有关欧阳修著作的记录。

7) 《舶载书目》，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2年）。

8) 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81年），第111页。

9) 见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81年），第102页。

表格 2

第二次资料	与欧阳修有关的著作
《舶载书目》	《欧阳公集》一部十本三十一卷，享保八年（1723）癸卯
	《津逮秘书》一部二十套二百本，宽延四年（1751年）未四月
	《百川学海》宝永七年（1710）
	《百川学海》正德三年（1713）
	《百川学海》一部二套十六本，宽延四年（1751）未四月
	《王氏彙苑》正德一年（1711年）
	《说郭》宝永七年（1710年），正德二年（1712年），正德三年（1713年），宽延四年（1751年）未四月
《商舶载来书目》	《欧阳公集》一部十本，享保八癸卯年（1723）
	《欧阳文忠公居士集》一部二十本，正德二壬辰年（1712）
	《欧阳文忠公五代史钞》一部一套，安永八己亥年（1779）
	《欧阳文忠公全集》一部四套，正德元辛卯年（1711）
	《百川学海》一部六套，宝永七庚寅年（1710）
	《津逮秘书》一部六十套，享保十乙巳年（1725）

通过以上两表格，可见第一次资料、第二次资料的记录中，与欧阳修有关的著作均是其文集或相关丛书，且书籍舶来数量众多。时间跨度从1710年至1852年，共计142年。记录中最早舶来的著作为含有欧阳修书论内容的丛书《百川学海》、《说郭》，两者均是1710年传来日本。而欧阳修的文集在以上记录中最早是1711年传来的《欧阳文忠公全集》。通过查阅第一次资料的记录，不仅可以了解每本著作的舶来时间，且著作交易的价钱也较为直观。第二次资料虽然是依据第一次资料编纂而成，但其中所记录的都是重要的书籍，可见江户时代确实有与欧阳修书论有关的著作大量传入日本且受到当时日本学者们的重视。

4 《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¹⁰⁾ 中的记录

书籍的传播除了已有刊本的流通，同时也在不断产生新的刊本，汉籍在日本也有翻刻传播的情况。翻刻对于书籍传播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查阅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其中与欧阳修书论有关的著作是和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三六卷》、和刻本《欧苏手简四卷》、和刻本《欧苏手简后编二卷》、和刻本《欧阳文忠公文抄三二卷》。

和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三六卷》，其中卷二十七中收录了欧阳修《集古录目序》。卷二十七末尾的落款为：“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绍熙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¹¹⁾可知此本欧集是欧阳发编，孙谦益校版本。此和刻本有日本学者添加的训点，刻于宝历十四年（1764）三月，为京都吉田四郎右卫门刊本，但所依据的底本是宋代刊本还是元代刊本

10) 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汲古书院，2006年）。

11) 见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文集》第二辑（汲古书院，1977年11月），第434页。

目前不明。另有日本学者皆川淇园所作的序言。皆川愿，字伯恭，号淇园，是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家，亦善书法。皆川淇园是对《欧阳文忠公集》进行翻刻的第一人，根据其序言：“病我邦未有刊本也，遂损资募工二年而刻成……/宝历十有三年癸未夏四月/平安皆川愿谨撰。”¹²⁾可知《欧阳文忠公集》在此之前并未有和刻本。皆川淇园也是此和刻本训点的添加者之一，参与点校的还有清田绚。从序言中，还可以看出他对欧阳修的文章有着极高的评价。“至宋有歐陽修，學韓愈而興古文，……故宋文繼修而起者，有三蘇，王安石及曾鞏。文質彬彬立稱後世，亦由修振也。”¹³⁾他将欧阳修视为宋代文学兴起的开端，正因为有了欧阳修，后世的人才懂得何为文质彬彬。

和刻本《欧苏手简四卷》有吉松润甫的校订，原作《欧苏手简》作者佚名。卷之一、卷之二中辑录了“庐陵先生”欧阳修的手简，卷之三、卷之四中辑录了苏轼的手简。此和刻本初刻于正保二年（1645）九月，为京都村上平乐寺刊本，后又有天明元年（1781）四月京都吉村新右卫门的再刻本。由于有元代杜仁杰所作的序，所以所据底本的年代最早也应该是元代的刻本。其中卷之一“与蔡君谟”条的内容与书论相关：“某启。……幽斋隙寂，时点弄笔砚，殊赖于斯。虽多无厌也，烦聒计不为嫌矣。诸留面谢。”¹⁴⁾意思是（欧阳修）幽居闲暇时，经常摆弄笔墨写书法，将情感寄托于此，且并未觉得厌烦或嫌弃。这种将书法当作平日消遣并乐于其中的态度，体现了欧阳修“学书为乐”的书学思想。

和刻本《欧苏手简后编二卷》刻于宽政九年（1797），为京都楠见甚左卫门刊本，又有同年的再刊本。原作《欧苏手简后编》为松本慎所辑录，其中卷之上“与梅圣俞”条的内容涉及书论：“……写来写去却转不如旧日，似逆风行船著尽气力抵在旧处不能少进，力竭心倦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人好笔迹真可贵重也。……”¹⁵⁾欧阳修通过自身的经历说明学书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没有进步的时候，此时难免心中倦怠，但他依然倡导应把书法当作一种乐趣，也点明古人热爱书法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值得后人学习。此番说法也体现出其“学书为乐”的书学思想。

和刻本《欧阳文忠公文抄三二卷》刻于庆应元年（1865），为日本官修刊本。原作《欧阳文忠公文抄三二卷》为明代茅坤辑录并书写批评。其中文抄十、文抄十一是对“书”的各种辑录，如文抄十一中“与石推官第一书”、“与石推官第二书”中就有涉及书论的内容，能够体现“学书有法”的书学思想。此外文抄二十二、文抄二十三是为“碑铭”条，也涉及与书论相关的内容。

此外，还有和刻本《易童子问》、和刻本《易童子问三卷易或问一卷》、和刻本《唐书二二五卷唐书释音二五卷》、和刻本《五代史七四卷》共4部对欧阳修著作的翻刻，但此4部翻刻中未有与书论相关的内容。

和刻本《易童子问》有塾村忠贞的点校，刻于宝永四年（1707），为随月轩刊本。和刻本《唐

12) 见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文集》第二辑（汲古书院，1977年11月），第248页。

13) 见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文集》第二辑（汲古书院，1977年11月），第248页。

14) 《新刻欧苏手简 一二》卷之一（皇都吉村新右卫门，1781年），第18页。

15) 《新刻欧苏手简 续编一》卷之上（京都堺屋仁兵卫，1780年），第23页。

书二二五卷唐书释音二五卷》，有堀正修的点校，刻于宽延三年（1750），后又分别有两版再刻本。和刻本《五代史七四卷》，有堀正修的点校，刻于安永二年（1773），后又分别有七版再刻本。和刻本《易童子问三卷易或问一卷》有石井光致的点校，刻于天保七年（1836），为须原屋茂兵卫刊本。

可见，最早被翻刻的欧阳修著作是刻于1645年的《欧苏手简四卷》，其中有能够体现出“学书为乐”书学思想的书论内容。之后又出现了《易童子问》、《唐书》两部著作的和刻本，1764年翻刻了《欧阳文忠公文集三六卷》，其中收录有各碑铭、《集古录目序》的内容。之后又陆续翻刻了《五代史》、《欧苏手简后编》以及《易童子问易或问》，其中翻刻于1797年的《欧苏手简后编》中也有体现“学书为乐”书学思想的内容。而《欧阳文忠公文抄》的翻刻时间较晚为1865年，其中有体现“学书有法”书学思想的内容。通过和刻本的欧阳修著作，使日本学者能够更容易的接触欧阳修和其书学思想，如对和刻本《欧苏手简》、《欧苏手简后编》进行点校的吉松润甫，或翻刻欧集的皆川淇园，他们均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本章小结

如今在日本现存的汉籍善本中，以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¹⁶⁾为参考，有关欧阳修的著作共58本。《毛诗本义》1本，《新唐书》（含残本）17本，《五代史记》8本，《太常因革礼》（含残本）3本，《洛阳牡丹记》1本，含有书论内容的欧阳修文集18本，《王氏书画苑》8本，以及《试笔》的单行本2本。出版时间大多是明朝刊本，其中2部《新唐书》以及2部《欧阳文忠公集》为宋代刊本。可见有关书论的欧阳修著作，不论是单行本还是文集、丛书都确实传入日本。从传入时间角度来看，江户时代是有关欧阳修著作传来日本的高潮，传入数量、种类都有明显的提高。

二 欧阳修书论在日本的引用

最早提及欧阳修的日本书论是平安时代的《才葉抄》¹⁷⁾。《才葉抄》的作者藤原教长¹⁸⁾（1109～1180?）为平安时代的贵族，擅书法。《才葉抄》用日语书写，于安元三年（1177）七月二日，通过归隐在高野山的藤原教长口传给世尊寺家第七代当主藤原伊经¹⁹⁾（1169?～1227?）。《才葉抄》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藤原教长的口传部分和后人的加笔部分。其中关于欧阳修的记录出现在加笔部分，据川濑一马《建武本宰相入道教長口傳解説並に釋文》：“（類從本）この増補者は世學寺伊經であるかもしれない。”²⁰⁾可见，增补者可能就是藤原伊经。《才葉抄》原文记载：“又只さはさはとゆがまず。文字の座もはたらかず書たる一の品也。宋朝の欧陽が眞は如此也。”²¹⁾在此段

16) 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3月）。

17) 《群書類从》第二十八辑，第四百九十四卷（东京续群書類从完成会），第148-154页。

18) 《日本书道辞典》（二玄社，1988年2月），第380页。

19) 《日本书道辞典》（二玄社，1988年2月），第374页。

20) 《龍門文庫覆製叢刊第九附印建武本宰相入道教長口傳解説並に釋文》（阪本龙门文库，1970年），第2-3页。

21) 《群書類从》第二十八辑，第四百九十四卷（东京续群書類从完成会），第150页-151页。

内容中，藤原伊经高度赞扬了欧阳修的楷书，认为是书法中的一等作品。²²⁾

《才葉抄》是日本最早期的书论之一，虽然已经提到欧阳修的书法作品，但没有与欧阳修书论有关的内容。而作为欧阳修有关著作传来的高潮时期江户时代，此时的日本书论中有很多对欧阳修书论的引用。

1 贝原益轩与书论《心画轨范》²³⁾

贝原笃信（1630-1714），字子诚，初号柔斋，晚年又号益轩。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本草家、教育家。其父贝原宽斋为筑前国福岡侯侍医，贝原益轩自幼受其父影响学习医学。著有《近思录备考》、《黑田家谱》、《益轩十训》、《慎思录》、《养生训》、《和俗童子训》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在其50岁之后，特别是71岁致仕以后完成的，现收录于《益轩全集》（全八卷）中。²⁴⁾

在其众多著作中，与书法相关的有书论著作《心画轨范》。《心画轨范》是贝原益轩众多启蒙书中的一部，书中用文字详细介绍了执笔、运笔的方法。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书论、书法和书评。内容大多是对汉魏以来中国书法家的相关论述的辑录，这之中就包括欧阳修《笔说》、《试笔》中的相关内容。也有少部分是对日本、朝鲜书家的书论内容的辑录，如细井广泽《书法论要》中“拨蹬法”的内容在《心画轨范》中也有收录。

以下，是《心画轨范》中辑录欧阳修《笔说》、《试笔》相关书论内容的总结。

“书论 六”部分录有：“六一居士笔说曰，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摹仿他人谓之奴书。”²⁵⁾ 此条内容辑自欧阳修《笔说》‘学书自成家说’条²⁶⁾。意思是学习书法当有自己独特面貌，若只是模仿他人的书法便是奴书。本条书论所体现的是欧阳修“自成一家”的书学思想。

“书论 七”部分录有：“欧阳公试笔曰，学书费纸，犹胜饮酒费钱。”²⁷⁾ 此条辑自《试笔》‘学书费纸’条²⁸⁾。意思是学习书法很废纸张，甚至超过了喝酒废钱。意在指明如果想学好书法应当勤于练习。

可见，贝原益轩在辑录书论时已将出处写明为“六一居士笔说”和“欧阳公试笔”，证明他应该阅读过《笔说》、《试笔》的完整内容，认同这两条书论的观点，所以将其辑录进《心画轨范》中。

此外，《心画轨范》还辑录了对欧阳修书法方面的评价，“书评 三十三”部分录有：“东坡曰，

22) 有关《才葉抄》的详论，参见拙稿《中国书论对日本平安时代〈才葉抄〉的影响》，见《文化交涉》第9号，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2019年11月。

23) 贝原笃信（益轩）辑《心画轨范》，正德二年（1712）一月京都永田调兵卫刊本。

24) 竹内诚、深井雅海编《日本近世人名辞典》（吉川弘文馆，2005年12月），第207页。

25)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8年），第6页。

26)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欧阳修全集》第5册，全集卷129，笔说一卷·学书自成家说（中华书局，2001年），第1968页。

27)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8年），第6页。

28)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欧阳修全集》第5册，全集卷130，试笔一卷·学书费纸（中华书局，2001年），第1978页。

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²⁹⁾ 此条辑自《东坡题跋》卷四‘题欧阳帖’条³⁰⁾。作者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在诗文、书法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苏轼在此跋中，赞美欧阳修的字笔势有力，字体清新，自成一家。他认为欧阳修的书法能够成为世间的珍宝，不只靠笔画的技法。贝原益轩应该也认同这一评价。

《心画轨范》全文是用汉字书写而非日语，也正符合贝原益轩所处的时代正值唐样书法盛行这一状况。

2 细井广泽与书论《观鹅百谭》³¹⁾、《拨蹬真诠》³²⁾

细井知慎(1658-1735)字公谨，号广泽，姓为藤原，氏为细井。是江户时代中期的书法家、儒者。他以擅长书法闻名，是江户时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其书法师承北岛雪山，并积极推广文徵明的书法。其门徒众多，如书家平林淳信、三井亲和、葛鸟石等人均出自其门下。著作多涉及书法，如《执笔拨蹬法》、《篆体异同歌》、《碑字考证》、《奇胜堂笔余》、《观鹅百谭》、《拨蹬真诠》等著书。

《观鹅百谭》用日语书写，里面辑录了很多中日书法家的雅文趣事以及细井广泽的注释。其中与欧阳修有关的内容为第38条“欧公日本刀歌末句”³³⁾。虽然此内容与欧阳修的书学思想无关，但书中既然已经辑录了欧阳修的故事，细井广泽将欧阳修作为宋代书法家的代表之一是可以确定的。

关于《观鹅百谭》的成书，北川博邦对《观鹅百谭》的解题有载：“本書成立の事情は、廣澤の自序自跋に明らかで、来游の童蒙の爲に、和漢の臨池の雑談を集め、臨池夜話と名づける一書を成さんとしたが、……臨池夜話の草稿中より興趣あるもの一百條を選んで奉ったもので、鶯の書法に縁淺からざるによって、觀鶯百譚と名づけた。すなわち本書は臨池夜話の拔萃本であり、享保十年五月に成ったのであるが、臨池夜話そのものは、すでに佚して傳わらない。”³⁴⁾ 可见，原先细井广泽收集中日学书的杂谈成《临池夜话》一书，后又从《临池夜话》中选取有意思的100条命名为《观鹅百谭》。所以《观鹅百谭》是《临池夜话》的精简本，成书于享保十年(1725)五月。而《临池夜话》现已佚失。

《拨蹬真诠》也由日语书写，内容是讲述书法中正确的拿笔方法，也就是“拨蹬法”。所谓“拨蹬法”，是指以“二王”为正统的双钩执笔法，也就是用食指和中指两个手指钩握住笔。其不同于书写和样假名书法时的单钩执笔法(仅用食指一个手指钩握住笔)。细井广泽对拨蹬执笔法(双钩法)的推广，对当时盛行书写唐样书法的日本书坛来说有很深的影响。

29)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8年)，第19页。

30) 《丛书集成初编》第1591册，《东坡题跋二》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87页。

31) 细井知慎(广泽)《观鹅百谭》五卷，享保二十年(1735)一月江户川村源左卫门刊本。

32) 细井知慎(广泽)《拨蹬真诠》，宝历六年(1756)九月江户花说堂须原屋平左卫门刊本。

33)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三卷(汲古书院，1978年)，第52页。

34)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三卷，解题(汲古书院，1978年)，第1页。

《拨蹬真论》中也引用了欧阳修《试笔》‘用笔之法’条的部分内容：“苏子美常言用笔之法，此乃柳公权之法也。亦尝较之斜正之间，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虚腕，则羲、献之书可以意得也。因知万事有法。扬子云：断木为棋，斲革为鞠，亦皆有法。岂正得此也。”³⁵⁾其中称赞了柳公权的用笔之法，且能将此用笔法发挥到极致的人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二人。正因为万事都有法度，才能得到正道。在解释执笔法的同时，也意指书家要学书有法。

3 泽田东江与书论《书述》³⁶⁾、《法书复古编》³⁷⁾

泽田鳞（1732-1796），字景瑞，号东江，姓为源，氏为泽田。是江户时代中期的书法家。其师承高颐斋，推崇明代王宠的书风。主张学书当临摹魏晋的古帖，也擅长篆刻。著有《书范》、《书话》、《书则》、《书述》等与书法相关的著作。

《书述》共分上、中、下三卷六篇内容，用汉文书写。上卷为书体、书论两篇，中卷为鉴赏、古碑两篇，下卷为法书、法帖两篇。内容主要是历代书体的变迁、书论、用笔之法、书法鉴赏、古碑法帖的真伪辨别等。关于《书述》的成书和刊行时间，“本書成立の年次は、卷首に安永二年の自序があり、また明和六年の「古今諸家人物誌」の澤田東江の項に著書として「書述」の名が挙げられているので、明和六年東江三十八歳以前のもと思われる。またその刊年は、「書籍割印帳」によれば、寛政四年八月、須原屋嘉助の刊行となっているが、今見られるものは全て寛政十年刊本であり、これは東江歿後二年になる。”³⁸⁾可知，《书述》的成书应该是在明和六年（1769）之前。后刊行了两版，分别是在宽政四年（1792）和宽政八年（1796），如今现存的版本只有第二次刊行的版本。

在《书述》上卷中，收录有《试笔》‘学真草书’条、‘用笔之法’条和‘李邕书’条的内容：“宋欧阳修试笔云，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名。（出自‘学真草书’条）又曰，苏子美常言用笔之法，此乃柳公权之法也。亦尝较之斜正之间，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虚腕，则羲、献之书可以意得也。（出自‘用笔之法’条）又曰，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出自‘李邕书’条）”³⁹⁾大意为欧阳修的《试笔》云：单日学草书，双日学楷书，楷书兼行书，草书兼楷书，十年不懈怠便可以成名。苏子美常说的用笔之法，就是柳公权的笔法。比较了斜正之间，便能分出优劣。能明白这一点和虚腕执笔法，就可领会到王羲之和王献

35)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六卷（汲古书院，1978年），第6页。

36) 泽田鳞（东江）《书述》三卷，宽政十年（1798）七月江户青黎阁须原屋伊八刊本。

37) 泽田鳞（东江）《法书复古编》，韩天寿校，宝历十四年（1764）正月写本。

38)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解题（汲古书院，1978年），第10页。

39)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一卷（汲古书院，1978年），第202页。

之的书法意境。“我”（欧阳修）最初得到李邕的书迹时，并不喜欢。然而后来越看越觉得别人的书迹很少能比得上他，虽然得到的最晚，但最为喜爱。“我”虽然因为李邕的书迹而获得笔法，然而作字绝不相似。

此段，泽田东江将欧阳修的三条书论内容合为一段进行引用，意指学书要勤奋并坚持不懈，并要掌握正确的用笔之法，而学书时又不能完全和古人一致。体现了“学书有法”、“自成一家”的书学思想。

此外，在《书述》中卷中，还收录有欧阳修《周史籀石鼓文》⁴⁰⁾《秦李斯峰山刻石》⁴¹⁾《秦李斯泰山碑》⁴²⁾《秦李斯之罘山刻石》⁴³⁾《后汉蔡邕酸枣令刘熊碑》⁴⁴⁾《后汉蔡邕老子铭》⁴⁵⁾《梁陶弘景瘞鹤铭》⁴⁶⁾《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⁴⁷⁾《唐欧阳询九成宫礼泉铭》⁴⁸⁾《唐褚遂良孟法师碑》⁴⁹⁾《唐褚遂良三龕记》⁵⁰⁾《唐李邕有道先生叶公碑》⁵¹⁾《唐蔡有鄰卢舍那瑠像碑》⁵²⁾《唐史惟则大照禅师碑》⁵³⁾《唐史惟则舞阳侯祠堂碑》⁵⁴⁾《唐张旭郎官石记》⁵⁵⁾《唐李阳冰滑州新驿记》⁵⁶⁾《唐颜真卿大唐中兴颂》⁵⁷⁾《唐颜真卿东方朔画赞》⁵⁸⁾的记载。《书述》下卷中，收录有欧阳修《淳化法帖》⁵⁹⁾《魏钟繇贺捷表》⁶⁰⁾的记载。以上碑刻、法帖均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法书复古编》是泽田东江的又一书论著作，也用汉文书写。共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书体、书家、执笔法、用墨法等内容，下卷为历代鉴藏书、法帖等的辑录。附录部分还收录有历代的书谈。在其“卷之上”中又一次辑录了《试笔》‘李邕书’条的内容。

泽田东江的门人芝严（芝田汶岭）《续文渊遗珠》⁶¹⁾上卷中也收录有《试笔》‘学书为乐’条的

40)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石鼓文”。

41)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秦峰山刻石”。

42)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秦泰山刻石”。

43)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之罘山秦篆遗文”。

44)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俞乡侯季子碑”。

45)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老子铭”，岁月见本文“延熹八年”。

46)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瘞鹤铭”，岁月未详。

47)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孔子庙堂碑”，武德九年。

48)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九成宫礼泉铭”。贞观六年。

49)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

50)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岑文本三龕记”，贞观十五年。

51)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有道先生叶公碑”，开元五年。

52)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蔡有鄰卢舍那瑠像碑”，开元十六年。

53)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大照禅师碑”，岁月见本文“天宝元年”。

54)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舞阳侯祠堂碑”，岁月见本文“天宝二年”。

55)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郎官石记”，岁月阙。

56)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唐滑州新驿记”，大历九年。

57)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唐中兴颂”，大历六年。

58)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唐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天宝十三年。

59)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十八家法帖”。

60) 辑自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魏钟繇表二”，岁月见本文“建安二十四年”。

61) 芝严（芝田汶岭）辑《续文渊遗珠》三卷，文化二年（1805）夏，江户千钟房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

内容。“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特稀也。”⁶²⁾意在告诉书家要保持对书法的热爱，将其当作是人生的乐事，体现了欧阳修“学书为乐”的书学思想。

4 石川鸿斋与书论《书法详论》⁶³⁾

石川鸿斋（1833-1918），名英，字君华，号鸿斋、芝山外史等。日本汉学家，擅长诗文、书画，师承西岡翠园，与来日的清人有广泛交集。其著作涉及广泛，诗文、书画均有专门著述，如《鸿斋文抄》、《文法详论》、《诗法详论》、《画法详论》、《书法详论》等。

《书法详论》是专门论及“唐样书法”的著作，用汉文书写。所谓“唐样书法”也就是以汉字作为书写对象的中国书法，有别于书写假名的“和样书法”。《书法详论》分为上、下两册，主要是关于笔法的讲解，包括点画形态、执笔法、运笔法、用腕法等。上册起始除有石川鸿斋的题诗以外，还有日本画家泷和亭的题书、日本书家长三洲的题字及清代学者江景桂的序言等，可见此书在当时被日中众多书家所知。此外，《书法详论》还编有附录，内容包括下笔次序、字画毫厘辨、新字三部分。下笔次序是关于笔顺的讲解，字画毫厘辨是对比相近字的音意区别，新字则是对一些不规范的俗体字、奇字等的记载。可以说《书法详论》是一部关于书法知识的普及用书。

在《书法详论》卷上中，引用了有关欧阳修书论的内容：“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⁶⁴⁾大意是解释运笔的要领，指运笔不能过于僵硬死板，用笔要侧锋中锋兼备。不同于上述几篇日本书论中能够体现欧阳修书学思想的引用，《书法详论》中的引用更偏向于具体的书写技法，在思想上没有过多体现。

但这段引用有两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句读出现了错误，由于此段原文出自苏轼的《笔说》，所以第一句的句读应是“欧阳文忠公谓余。……”，也就是欧阳修跟我（苏轼）说。但由于书论的内容还是出自欧阳修，所以句读的错误不影响书论观点的理解。二是石川英在引用时出现了丢字的现象，所引用的原文第二句应是“当使指运而腕不知”，其中“指”字没有出现在《书法详论》的引用中。此处错误对原文的理解有一定影响，会导致阅读时文意不通，此句完整的意思应是运笔时应该使用手指的力量带动手腕。

本章小结

本章分别对贝原益轩和其书论《心画轨范》，细井广泽与其书论《观鹅百谭》、《拨蹬真诠》，泽田东江与其书论《书述》、《法书复古编》，石川鸿斋与其书论《书法详论》进行了探究。

继平安时代末期日本最早的书论之一《才叶抄》中出现了欧阳修楷书的赞美，《心画轨范》、

62) 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八卷（汲古书院，1978年），第170页。

63) 石川英（鸿斋）《书法详论》，明治十八年（1885）八月东京博文馆刊本。

64) 石川英《书法详论》卷上，见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第二卷（汲古书院，1978年），第278页。

《观鹅百潭》、《拨蹬真诠》、《书述》、《法书复古编》、《书法详论》六部日本书论著作，均对欧阳修的书论原文进行了引用。其中除《书法详论》中的引用内容是单纯讲解书法实践的技法，其余各著作中的引用内容均可体现欧阳修的书学思想，可证当时的日本书家认同并接受了欧阳修的书学观点。此外，几篇引用欧阳修书论内容的著作均作于江户时代，符合前文有关欧阳修书论著作在江户时代大量传入日本的调查。

三 欧阳修书学思想在日本的受容——以书论《梧竹堂书话》为中心

欧阳修的书学思想可总结为“以德为先”、“学书为乐”、“自成一家”、“学书有法”四点。“以德为先”指对书家品德的重视，书家品德高尚其作品才能流传。“学书为乐”指将书法视为人生的一件乐事，若将书法当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难免会丧失对书法的乐趣。“自成一家”指书家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能一味模仿前人，否则便是奴书。“学书有法”指书法创作要遵从基本的书写规则，不能以怪为美，书法在创作的同时也要保持其实用性，可以识读。此外，“学书为乐”这一思想还进一步发展出宋代的“尚意”书风。由于宋代书家不再将书法视为一件严肃的事情，使得书家们在创作时更加随意自如，更加重视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体现在书法作品中便是不拘一格，随心而书。

佐佐木盛行在《人と書芸術の実証的研究》⁶⁵⁾中将中林梧竹的书法艺术真髓分为六点，分别是“六朝の書”、“自運の書”、“創意の書”、“性情の書”、“信仰の書”、“偽作の書”。其中有对欧阳修书学思想的体现。

1 中林梧竹与《梧竹堂书话》概说

《梧竹堂书话》作者为中林隆经（1827-1913），也称中林彦四郎，字子达，号梧竹，是明治时代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师承市河米庵的门人山内香雪，书法作品以润达的风格为主。中林梧竹曾在明治十五年（1882）和明治三十年（1897）两次渡海入清学习书法，师从潘存，并从中国带回了很多六朝时代的古碑拓本。

关于《梧竹堂书话》的编纂，内村嘉秀《『梧竹堂書話』の研究》中有载：“『梧竹堂书话』は、中林梧竹が書き残した書論である。海老塚の傳が、梧竹の孫娘橋本きみ子氏から借り出した梧竹の遺稿中に、漢文で書かれた草稿を発見し、梅園方竹の協力を得て整理編集し、「梧竹堂書話」と標題して晚翠軒から昭和六年に印行したものである。”⁶⁶⁾可知，最初只是中林梧竹用汉字书写了书论的残稿，而《梧竹堂书话》是海老塚的傳和梅園方竹根据中林梧竹的手写书论残稿整理汇编而成，《梧竹堂书话》这一名称也是由此二人命名，并于昭和六年（1931）印刷出版。

前文已述梧竹的书法真髓共有6点，其中“自運の書”和欧阳修“自成一家”的书学思想相

65) 佐佐木盛行《人と書芸術の実証的研究》（西日本文化协会，1991年）。

66) 内村嘉秀《『梧竹堂書話』の研究》（木耳社，2013年2月），第327页。

类似。由于梧竹曾入清学习六朝书法，形成了在其原有书风上又融和中国六朝书风的独特面貌。学习而非模仿，这种“自運”的理念与欧阳修“自成一家”书学思想相对应。“心艺”也是《梧竹堂书话》中总提到的一点，意思是书家要以己之心作己之书，用书法展现自己内心的想法，可以总结为“性情の書”这一书学思想。佐佐木盛行对“性情”的解释如下：“性情とは、性質と心情である。……書の立場から考えた場合、芸術は所詮人間の投影であり、書心の鏡である。この時の巧拙・美醜は、技巧を超えて、品性を反映する。従って、能筆であっても、魂の清く、高潔な品性の持ち主でなければ、下品な書格となる。”⁶⁷⁾可见“性情”与欧阳修“以德为先”的书学思想及宋代“尚意”理念相类似，而“尚意”理念来源于欧阳修“学书为乐”的书学思想。

2 《梧竹堂书话》中所体现的欧阳修书学思想

《梧竹堂书话》共有书论50条，从中体现的书学思想不仅多处类似于欧阳修“以德为先”、“自成一家”、“学书有法”的书学思想，一些条目还更为直接的使用了欧阳修提出的“奴书”这一概念。以下，列举《梧竹堂书话》中较典型的条目进行对比分析。

第28条：“物徂徠、气宇高朗、学术广邃、雄视一代。故其书精妙、不可言。笔力之遒、风品之高、遥超绝于众家、卓然为（成）一家。古人曰、退笔如山、不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真然。”江户中期的儒者荻生徂徠，正因为其气概高朗，学问博大，所以他的书法笔力遒劲，书品高昂。这与欧阳修在书论中称赞唐代书家颜真卿相似，如《集古录跋尾》‘唐颜鲁公二十二字帖’条：“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竒伟，有似其为人。”⁶⁸⁾欧阳修认为颜真卿此人忠诚义勇，是出于他天生的本性，因此他的书画刚劲独立，不沿袭前人，挺然竒伟，就像他的为人。徂徠和颜真卿都因为品德高洁，所以书作被人认可。

第31条：“凡书、趣之隽味之永者、不在点画之工、而在风神之高……而风神之高、关于人品之高、人品之高、本于存心之高……”梧竹指出书法的精妙并不在于字的点画，而是在于风神的高度，而风神的高度与书家的品德有关，高洁的品德源于本心。《『梧竹堂書話』の研究》也对“风神”有以下解释“「精神的な格調の高さ」を象徴するものである。”⁶⁹⁾也就是书家内心的品德要高洁，作品才能富有风神。

以上两条书论，可以体现出欧阳修“以德为先”的书学思想。

其次，欧阳修“学书有法”的书学思想可以在第14条、第45条中体现。

第14条“或问、如何是书法第一义。曰、廓然无法。曰、然则侧、勒、弩、趯之类、可悉废乎。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书法最重要的是不拘于一格，但是不可以废掉侧（点）、勒（横）、弩（竖）、趯（挑钩）之类的“永字八法”等古法。指学书要遵守常规。

67) 佐佐木盛行《人と書芸術の実証的研究》（西日本文化協会，1991年），第55頁。

68)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欧阳修全集》第5册，全集卷141，集古录跋尾·卷八（中华书局，2001年），第2261頁。

69) 内村嘉秀《『梧竹堂書話』の研究》（木耳社，2013年2月），第336頁。

欧阳修曾给石推官（石介）书写信件，批评他的书作无法识读，没有常法。“君颀家有足下手作书一通，……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辨其点画，乃可渐通。吁，何怪之甚也！”⁷⁰⁾ 欧阳修对石介这篇难以识读的书作的评价是十分怪异，可见其不认同这类没有基本法度的书法作品。《梧竹堂书话》第45条也有类似内容：“学禅未能得正法眼者、谓之野狐禅。未能得古人之笔意、而放肆奇怪、高自标榜者、亦书中之野狐禅也。”意思是学禅法若没有学得正法，便是野狐禅。学书也是同理，若不得古人笔意，以奇怪著称便是书法中得野狐禅。指明书家不能以怪为美，体现了欧阳修“学书有法”的书学思想。

此外，《梧竹堂书话》第25、26、27条中更为直接的使用了“奴书”概念，“奴书”一词由欧阳修首次提出，在其书论中也多有出现，指明没有创新的单纯模仿是没有价值的，明确体现了“自成一家”的书学思想。

第25条：“黄庭坚曰、丈夫自有冲天气。不向如来行处行。书家亦不可无此气象。不然则縱令有能成、不能免为奴书也。”书家要有独特的气质。不然即使技法巧妙，也免不了成为“奴书”。

第26条“奴古人者少、奴于古人者多。能至奴古人（者）、则书亦不朽之盛事也。”意思是能够突破古人的少，但拘泥于古人的多。若能突破古人，则一定能以书法闻名。

第27条：“幕府以来、以书名家者不尠。而多奴书、不足见也。其病盖在以象似为工。规々矩々、趋趋于襄阳文敏之门、彷徨于玄宰衡山之庭、卑屈自安者、概皆是也。書品之不高、亦不足怪也。”江户幕府以后，以书法家自居的人不少。但大多是奴书，没有欣赏的价值。他们的缺点是以学书相似为好。追逐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文徵明的书法，满足于模仿，都是奴书。书品不高，也不奇怪。

《梧竹堂书话》的第7条，还讨论了有关“心艺”的内容。

第7条：“今之书家、开口则曰、书心艺也。书之为心艺、固无论矣。然心艺岂容易哉。盖以己之体样、写己之心情、是心艺也。书千字而千字如一、书万字而万字如一、世人以为妙。然是腕指之巧而已。非心艺也……今之书家、多依体而书体。是古人之体而非己之体也。依样而书样。是古人之样而非己之样也。非出于己之心情也。结构虽妙、不过腕指之巧也。何有于为心艺哉。”梧竹认为心艺是指用自己的字体书写自己的心情。若是写的千、万个字全都看起来一样，那么只是手腕的技巧，不是心艺。“心艺”指书家的内心情感。中林梧竹指出书家不能仅是练习书写技法，还要在书写时感受自己的内心情感，通过笔墨将自己的心境展现出来。这与宋代“尚意”的时代特点相吻合，而“尚意”书风正是以欧阳修“学书为乐”书学思想为基础进一步深化而成。从这点上来看，也能体现中林梧竹对欧阳修书学思想的受容。

通过以上对各条书论所体现的欧阳修书学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梧竹堂书话》和前文论及的其他日本书家的书论著作有所不同，《梧竹堂书话》并不是单纯的将欧阳修的书论内容进行引用，而是将欧阳修的书学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可以说作者中林梧竹对欧阳修的书学思想

70)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欧阳修全集》第3册，全集卷68，居士外集·卷十八，与石推官第一书（中华书局，2001年），第991页。

不仅是认同，而是更近一步接受了欧阳修的书学思想后，形成了自己的书学思想。二人的思想相互联系，可见在日本书界对欧阳修的书学思想有受容。

3 中林梧竹书法作品中所体现的欧阳修书学思想

书学思想不仅可以通过书论展现，在书法作品中也能够具体体现。中林梧竹的书法作品众多，但其50岁前与50岁后的作品风格迥异。以下图片1与图片2（图片来源《人と書芸術の実証的研究》）分别为中林梧竹20岁书写的板额《万年山》和49岁书写的揭额《通身手眼》，可见点画厚重，用笔圆润流畅。二者均是梧竹50岁之前的作品。而图片3（图片来源《人と書芸術の実証的研究》）是梧竹61岁书写的对幅《易曰》，明显点画变为瘦硬有力，用笔改方笔为主，包含着浓重的金石气息。

出现风格变化的原因是梧竹在50岁开始接触并学习当时中国清代盛行的碑学书风，后将碑学中的苍茫大气的风格融入进自己原本的书风中，遂形成其50岁后半既包括古拙质朴又蕴含秀丽的独特风格。从梧竹50岁前后书风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在学书过程中并没有单纯模仿，而是将两种风格融合进而形成自己的书风，体现出欧阳修“自成一家”的书学思想。



图片1



图片2



图片3

此外，中林梧竹的临摹作品风格，也符合宋代“尚意”书风。“梧竹の臨書は、一見すると、似ていない。独特の臨書である。……これは、梧竹が、飽くまでも、羲之の本質を把握して、自己の性情で、自運の書を展開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⁷¹⁾可见中林梧竹的临摹作品初看和原作并不相像，是很独特的临摹。梧竹早年临摹王羲之的书帖是追求字形相似，而70岁之后临摹王羲之的

71) 佐佐木盛行《人と書芸術の実証的研究》（西日本文化协会，1991年），第100页。

书帖则达到了意态相似但字形不像的境界。梧竹在临摹时不再注重字形相似，原因是他认为书法的本质并不是对字形的书写，而是通过点画运笔来表达心中的情绪。以书家自己的内心为本，也就是“自運の書”，和宋代“尚意”的风气一致。同时这种独特的临摹风格，也体现出欧阳修“自成一家”的书学思想。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解读《梧竹堂书话》的各条书论，总结其中所体现的欧阳修的书学思想。《梧竹堂书画》中并没有直接对欧阳修书论的引用，而是表达了作者中林梧竹自己对书法的理解。但从梧竹的书学思想中，可以看出与欧阳修书学思想的趋同性。所以《梧竹堂书话》是欧阳修的书学思想在日本有所受容的体现。

此外，从中林梧竹的书法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欧阳修书学思想的接受。一是由于梧竹学习碑学书风的方硬劲挺，其书风从50岁前的圆润流畅，变为50岁后的既古拙又秀丽的独特风格。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学书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将两种风格融合进而形成自己的书风，体现出欧阳修“自成一家”的书学思想。二是通过他70岁之后对王羲之书帖的临摹由追求字形相似变为意态相似。可以看出他学书遵循个人内心情感，风格独特，既体现出欧阳修“自成一家”的书学思想，也符合宋代“尚意”这一时代风气。

结语

本文首先探究有关欧阳修书论的著作在日本的传入情况。包括《笔说》、《试笔》、《集古录跋尾》，及后人编纂的欧集，含有欧阳修书论内容的历代丛书。

通过查阅平安时代末期的贵族日记、《金泽文库古书目录》、江户时代的唐船持渡书、《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可推论欧阳修的史学类著作在平安时代末期已经传入日本，而周必大版本的《欧阳文忠公集》曾收藏于金泽文库，其传来时间应该晚于平安时代，之后收录有书论内容的欧阳修文集和历代丛书在江户时代大量传入日本，至宝历十四年（1764）三月出现了第一本对欧集的翻刻，也就是皆川淇园所翻刻的和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三六卷》，据书中记述尚不明确其所依据的底本是宋刊本还是元刊本。皆川淇园是对《欧阳文忠公集》进行翻刻的第一人，其翻刻的版本是欧阳发编《欧阳文忠公文集》，且为此和刻本添加了训点和序言。而在此之前，最早被翻刻的欧阳修著作是刻于1645年的《欧苏手简四卷》，此中有能够体现出“学书为乐”书学思想的书论内容。和刻本的出现证明日本学者对欧阳修文集的需求量增大，也使更多的日本书家、文学家了解欧阳修及其书学思想，是欧阳修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的证明。可见有关书论的欧阳修著作，不论是单行本还是文集、丛书都确实传入日本。

其次，探究欧阳修的书论在日本的引用。贝原益轩的《心画轨范》是一部日语书写，以发展书法教育为目的的书法启蒙书。内容除详细介绍了执笔、运笔的方法之外，还引用了很多中国书

家的相关论述，其中包括欧阳修《笔说》、《试笔》的部分内容和苏轼对欧阳修书法方面的评价。细井广泽的《观鹅百谭》同样是一部用日语书写的书法教育用书，内容辑录了中日书法家的雅文趣事，其中第38条为“欧公日本刀歌末句”。其另一著作《拨蹬真诠》讲述执笔方法也就是“拨蹬法”，其中引用了欧阳修《试笔》的部分内容，意指书家要学书有法。泽田东江的《书述》主要是讲述历代书体的变迁、学书方法、书法鉴别等，其中引用欧阳修《试笔》、《集古录跋尾》的部分内容。其另一著作《法书复古编》中又一次引用《试笔》‘李邕书’条的内容。此外，泽田东江的门人芝田汶岭《续文渊遗珠》中也收录有《试笔》‘学书为乐’条的内容。石川鸿斋的《书法详论》中也引用了欧阳修的书论，但其内容是单纯的介绍用笔技法，没有书学思想的体现。

最后，以中林梧竹的《梧竹堂书话》为中心，探究欧阳修的书学思想在日本的受容。与上述的日本书论著作不同，《梧竹堂书话》并不是对欧阳修书论的原文进行引用或是提到欧阳修相关的内容，而是书写了梧竹自己的书学思想：“自運の書”、“創意の書”、“性情の書”、“信仰の書”，且与欧阳修“以德为先”、“自成一家”、“学书有法”的书学思想相一致。中林梧竹强调书法中的“心艺”，这与宋代的“尚意”书风也有相似之处。可见《梧竹堂书话》相较前文的日本书论著作，并不是单纯的对欧阳修书学观点的认同，而是更近一步的在思想方面接受并运用了欧阳修的书学思想。且从中林梧竹的书法作品中也体现欧阳修的书学思想。

以上，通过对日本书家们的书论著作和书法作品进行分析，体现出欧阳修的书学思想在日本的受容情况。

